

# 中國遊士時代始末略論

## ——戰國篇

王健文 林珩秀

蕭惠卿 黃能得

陳銓美

### 前言

#### 一、解題

本篇名為「中國遊士時代始末略論」，其中「遊士」一詞，早已是耳熟能詳，而「遊士時代」一詞却似乎未見有人提出過。本篇以「遊士時代」稱呼西元前五百年至西元前一百年，四百年間的中國，乃就士階層之發展脈絡言，並非以遊士作為該時代唯一或最主要的象徵。在整個歷史發展脈絡裡，或許應有不同的時代畫分法；或許應另尋一更能代表該時代的象徵，然而，以上二者，却非筆者意圖在此解答者。

「遊士」一詞早有人使用<sup>①</sup>，然其內涵却有相當歧異性；而「遊士時代」更是沒有明確的界定過，以下便分別對此二詞賦予本篇中所使用之界說。

#### A、遊士

中國遊士時代始末略論

事實上在戰國以後，封建秩序已漸失去其意義，「士」的組成分子及其階級性意識形態，都和春秋以前大不相同。一般的說法，土原指貴族中最低等的一層，或說務農，或說爲武士，或說爲國人的部分②，難有定論。戰國以後的士才開始有較清楚的形象，大致說來，「士」不再以身分界定，而以其性質界定。「知識階層」中去除國君，大概就是當時士的最基本界說。此時「士」的分子相當複雜，有商人出身，有軍人出身、小地主，或是沒落的貴族，不同出身的士往往具有不同的心態，這我們將在後面討論。

士不一定就是游士，游士只是就當時一般潮流擬出之名詞。「游」的意義有地理上的，有社會地位的，有觀念上的，在戰國時期，上述三種意義都極爲普遍，但本篇中採取的是第三種意義，即「士無定主」之狀態，這裡的「主」泛指君主、地域，亦含有「無恆產」「無恆心」之意義。由於第三種意義，前二者也隨之而生③。

根據上述，顯然有些人必須排除在游士範疇之外，這些人多半是貴族後裔，屈原即爲一例，但這些人在戰國時代屬於少數，不能發揮太大作用。

### B、游士時代

本文將游士時代期限取於西元前五百年至二百年間，上下限乃取其約數，上限大致以孔子（551-479 B.C.）爲準，下限則用漢武帝（在位期間 141-87 B.C.）爲準。期間包括春秋末（—481 B.C. 春秋紀事之末）、戰國（480-222 B.C.）、秦（221-206 B.C.）、漢初（206 B.C. —）諸代，約四百年。

上限取自孔子，乃因孔子以後士的性格有了大轉變④，「士」在孔子之後演變成爲「游士」，孔子雖未必是這轉變中絕對關鍵人物，但作爲分期的標準是無疑的。

下限取自漢武帝，理由如左：

(一) 秦在戰國時已向壓抑游士，統一天下後，更有焚書坑儒之舉，但漢興之際，游士再盛，景武之時，仍有六國養士餘風：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⑤

孝王，賢太子少子也……招延四方豪傑，自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⑥

統一帝國漸定型之後，朝廷不再容許這些勢力在其控制範圍之外，一方面打擊養士之大家，一方面則裁制游俠（游士之一種）：

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眼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

郭解翁伯。⑦

逐步將這些溢於朝廷控制之外的政治、社會勢力收回，到武帝時告一段落⑧。

(二) 馮友蘭將中國哲學分爲文學時代與經學時代，主張兩時代之畫分以董仲舒之統一思想政策提出爲準⑨，筆者以爲頗有見地。蓋由於統一帝國的需要，所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思想的統一成爲必要的措施。當董仲舒提出如此主張：

故養士之業者，莫不滌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

下之士。<sup>⑩</sup>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sup>⑪</sup>

時，游士不但外部受到壓制，且在內部也受限制，於是「士」的性格在此時又有了一大轉變，游士時代就此告終。

## 二、問題的提出

我們為什麼選擇這個題目？游士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什麼意義和地位？

士階層在中國兩千年來一向居舉足輕重之地位，是社會的安定力，也是文化發展的動力。中國歷史為人詬病最深的，乃是「兩千年的黑暗專制，兩千年墨守成規，毫無進展的學術。」是不是這樣呢？這問題太大了，一時也難回答。對中國古代游士的探討，是我們解答這問題的第一步。從時間上看，游士時代正是統一帝國的塑成期；從內容上看，游士是後代知識階層的前身。藉著討論統一帝國塑成期的知識階層，或許我們能為這兩千年的統一帝國的發展找到其源頭，順流而下，應是較可行之路。

關於游士時代之始末及其意義，說得最透徹的是東方朔的「答客難」，其文曰：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朔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陳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動道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風；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幅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

.....<sup>⑫</sup>

時異事異，而此異正是中國史上一大變局，對此變局無真了解，則往後兩千年的歷史便不易了解。游士是這變局中一項主要的指標，針對游士而論，我們有此下述問題的提出，而這些問題也正是我們這篇報告所意圖瞭解與解答的。

- (一) 游士何以產生？其外在背景？內在演變？
  - (二) 游士以何種姿態與地位在國史上活動？其作用如何？
  - (三) 游士在秦漢統一後有何發展與轉變？其影響如何？
- 這三個問題將分別在背景篇、戰國篇、秦漢篇中討論。

### 三、討論方式（戰國篇）

本篇分爲七節，分別是：

- (1) 社會的變動。
- (2) 國家性格的改變。
- (3) 士性格的改變與發展。
- (4) 禮賢養士之風。
- (5) 「哲學的突破」與「道統」「政統」相互之關係。
- (6) 從「商君書」到「呂氏春秋」。
- (7) 統一帝國的塑成。

先討論春秋戰國之交的經濟社會變遷；隨後述及因國家規模的不同，國家內部結構之改變，再加上第一節的社會變動，造成了國家性格的改變。這前兩節便成爲士性格改變與發展之外在原因與動力。三至五節分別討論士性格之形成，國君或卿相的禮賢與養士，士階層思想內在理路的發展大勢及「政統」「道統」之相互關係。着重在士本身的描述及學術政治之相互關係，以上大致爲總論全時期各個地區。接著便特別提出秦國的情形再以討論，因秦統一中國，秦政及秦之思想對以後百年有相當重大的影響，且可由「商君書」與「呂氏春秋」時代之先後，略窺當時學術與政治思想之演變。最後

節以統一帝國的塑成，承上以總結戰國，更爲秦漢後之討論指出一些門徑。

## 戰國篇

### 一、社會的變動

春秋以來，中國（至少在黃河流域）社會有了極大的變動，而此變動之來源則分別是政治、文化、經濟、社會諸方面之交互影響而成。由於西周數百年維持著相當程度的安定，因此人口增加，在生產技術方面，也有相當的突破。商業漸趨發展，都市文明產生，而諸國間不斷的戰爭，都不停地推動著社會的變化，以下分四點略述之。

#### A、生產技術

春秋戰國時代，生產技術有了相當的突破。戰國時有鐵器的應用，而牛耕技術之發明，更有人稱之爲一次晝時代的生產革命<sup>⑬</sup>。生產技術的改進，使得產量大增，所能養活之人口也隨之增加。據管東費先生之估計，戰國中期人口大致有二千五百萬人<sup>⑭</sup>，更重要的是：「單位面積的生產量，必然隨著牛耕技術的進步，而快速增加；土地墾殖的面積，也必定迅速擴大（因爲有剩餘勞力可用以開荒）。如此就大規模地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農產品的增加，本身便由直接消費品而轉向商品化。」<sup>⑮</sup>，在此刺激下，經濟形態與生活形態便有了新的面貌。

#### B、都市與商業

中國遊士時代始末略論

在商品經濟出現後，各地之間的貿易量大增，據許倬雲先生的研究，各地物產的相互倚賴與貨幣流通之考古發現，證實至戰國時代已有十分繁榮的經濟。而比較春秋與戰國的都邑，更可見其極大之差異，戰國都市，如蘇秦所形容的臨菑，竟有二十一萬人口之多。在這許多人口衆多的都市中，必然存在許多不耕而食，以商賈、工藝、或爲小吏之人存在，複雜的生活環境，造就了種種不同的人才，而各地藉著商業活動而進行的相互之交通，更開闊了人們的眼界，知道世界之大。<sup>①⑥</sup>

於此，何烈先生有言：

封建制度原來是建築在自給自足的采邑經濟之上的，現在采邑經濟無法維持，交換經濟起而代之。以往「民不遷業」的局面，迅速瓦解。封建貴族失去了拘束平民的能力，再不能維繫「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工」的舊社會體制了；連貴族本身，也多降爲編戶齊民。采邑經濟的破產，幾乎與封建制度的動搖同時發生。<sup>①⑦</sup>

### C、戰爭頻繁

根據許倬雲先生的研究，春秋時期（722-464 B.C.）兩百五十九年中，不曾發生戰爭者僅三十八年；戰國時期（463-222 B.C.）兩百四十二年間，和平期共八十九年。連年戰禍，使得人民流離失所。而戰國時戰爭形態的改變（規模擴大，以步騎代車戰），使得戰爭不再是貴族的專利。大量的平民被納入軍中，使社會結構產生了巨大的變化，許多人民由此出頭，更多人民因此握有軍事力量，從事這種新的行業。「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等到孔子以後，竹帛下於庶人，再加上平民原來握有之專業能力，舊日貴族不再獨佔社會的上層階級了。<sup>①⑧</sup>

### D、從靜態社會到動態社會

依據上述，可知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由靜態的封建社會、采邑經濟走向動態的流動社會的過程。其動態面有兩個層次：

- ✓(1) 橫的移動——指地域間的遷移。這在春秋時尙少見，而戰國時則蔚爲普遍現象，故戰國時君主每有「來民」之希望。這種橫的移動兼受經濟和軍事的影响，對各國間的溝通有莫大的幫助。
- ✓(2) 縱的流動——即所謂「社會流動」。商業的發達使得商人崛起，而戰事的頻繁又使貴族與平民間界限日益模糊。據許倬雲先生的研究，出身寒微而在歷史舞台上活躍者，春秋時約爲百分之二十六，戰國時則升至百分之五十五。<sup>①⑨</sup>

## 二、國家性格的改變

在上述社會變動的背景下，再加上國家本身內外性質的改變，戰國時國家之性格便與西周初乃到春秋時大不相同。

### A、外部規模的擴大

西周初封之時，各諸侯國領域很小。

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sup>②⑩</sup>

西厲王後（—841 B.C.），周室威權漸失，原有秩序瓦解，諸侯間相互兼併，甚至有大大國與王

室作戰。齊桓公（在位期間 685-643 B.C.）後霸政出現，天下重心由王室移至大國。而後晉楚爭霸，歷有百年，至晉悼公以後（在位 572-558 B.C.）霸政始衰，却又演變成七大國併立的局面，由周初的方百里，而至戰國的方千里，變化不可謂不大。<sup>②</sup>

### B、內部結構的改變

國家擴大了，在管理上當有相當的改革，方能應付實際需要。第一個明顯可見的變化是由家族合治變為初步的官僚制；第二個即是由分封采邑之封建制度為郡縣制，于此，顧亭林有論曰：

漢書地理志，言秦併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蠲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子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為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為也。以余觀之，殆不然。……

其後他舉了許多春秋戰國時各國分置郡縣的例子，接著論道：

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并而為十二諸侯，又并而為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謂罷侯置守之始終於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sup>③</sup>

### C、性格的改變

在此我們首先應注意，不能把現代的國家觀念與春秋戰國時的國家相混淆。尤其春秋時，許多國家都互有親戚關係，且各國之間差異不大，交通不很困難，一般平民沒有所謂國家觀念，只知道有領主，國與國間由於貿易或戰亂，或另尋出路，平面的移動非常頻繁，不像現代國家般的涇渭分明。

春秋時諸國猶有親緣關係，但由於國家擴大的需要與社會流動，觀念之改變，時間之長久，親緣關係解紐，降至戰國，七大國彼此本無親緣關係，再加上彼此以利相傾，國與國間關係無任何禮法之約束，而領土的擴大，戰國各國不再是城市國家，而是不折不扣的領土國家。

這時，有個奇妙的現象，即各國在上者（君王、貴族）互鬥長短，各不相讓，而底下之平民（尤指商賈、游士）却「互通有無」，不認同於他出生地之國家。事實上若要他們認同的話，便有三個對象：宗族、國家、天下，顯然的，當時的游士商賈的認同，少有以國家為對象者。

### 三、士性格的改變與發展

在上述社會、經濟、政治皆有大變動的基礎下，士階層有著怎樣的改變與發展？

#### A、概說

士階層在戰國的發展，大致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討論：

- (1) 組成分子複雜化。
- (2) 階層風格之形成。

論者多以孔子為士階層轉變的一大關鍵，因孔子首先將士的格局擴大。他的有教無類，使得知識階層包括更廣，上至貴族，下至平民皆有；他更重要的貢獻，是使得士的眼界放寬，心胸開闊，更建立了所謂「道統」，提出道為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這影響以後兩千年知識分子至深，在此不能詳論

。④

## B、組成分子

士原來是封建秩序中的一層，到了春秋末以至戰國，由於學術下於民間，知識分子增多，再加上社會流動的迅速，誠如余英時先生言：

由於士階層適處於貴族與庶人之間，是上下流動的匯合之所，士的人數遂不免隨之大增。這就導致士階層在社會性格上發生了基本的改變。<sup>②4</sup>

組成分子從來源看，有原來的士，有貴族下降者，有平民上升者；從職業來看，有軍人、官吏、商賈、策士等，各種不同的來源與職業，使得士階層的風格也有許多不同的面貌，這是可以深究的問題，但不論能力、時間，都不是筆者現在所能做到的。

## C、階層風格之形成

既然各種士之不同面貌不是我們現在所能比較的，現僅就其共同的風格述之。

戰國時，士的最大風格，應該是「游」，即所謂「士無定主」之狀態。士何以游？可以從前面所作的論述中推測一二。以下就經濟結構與游士的關係，作一敘述。

杜正勝先生有云：

商業城市未興盛，商業經濟未激盪土地經濟之前，近代的個人遷徙自由對古人無甚意義的。<sup>②5</sup>

當商業未起時，農業社會之凝固性甚強，對土地的依戀與附著性大，因此難以產生往來各地之人

。而商業漸興後，各地之交通轉繁，游士產生背景之一於焉生矣。於此作二推測：

推測一：春秋時商業未興，游士不盛，僅有兩種情況。其一，被迫出奔；其二，君主授意，如齊桓公時之游士八十人。戰國時商業漸發達，游動者增加，成為游士重要來源之一。

推測二：戰國游士主要來源之一為商人，而自成一集團，始終效忠其君者，多為從事農業與純粹手工藝者，地主、商人、農民之間交互作用，是歷史走向要因之一。

游士不再附屬於一國一君，雖然他們本身也有許多不同類型，但他們却產生了階層的意識，成為以後中國歷史的主導力量之一。

## 四、禮賢養士之風

上一節敘述士階層本身的發展，現在則略述國君或貴族對待游士的態度。

## A、禮賢

戰國時，國君之禮賢，蔚為風尚，其中以魏文侯開風氣之先（在位445-396 B.C.）：

文侯愛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sup>②6</sup>

此下國君禮賢的例子亦所在多有：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辭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sup>②7</sup>

鄒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

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sup>28</sup>

## B、養士

養士與禮賢不同，禮賢是國君對少數賢者的尊禮，而養士則是貴族卿相供養游士以供己使用，有賢有不肖。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sup>29</sup>

養士之風亦為戰國時一大潮流，大致各國卿相皆養士，如廉頗、呂不韋等，尤要者為信陵君、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號稱門下食客三千，數量不可謂不大。

養士者多有以不同待遇對待其門下食客，蓋因賢不肖相混，不如此無以別之，有功則食客亦可升等。貴公子之養士，有的氣焰極其高張。

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現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渺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sup>30</sup>

## C、不治而議論

國君之禮賢與卿相之養士，乃由於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甚至卿相與卿相之間，競爭日益激烈，此時社會上大批由上下匯流所產生的新興士階層，正是最好的幫手。加以當時諸子多倡尚賢理論，以賢人為國之寶，在此基礎下，更加速而推廣了士階層之流動，成為一時象徵之「游士」。這種禮賢養

士之風，於齊稷下學士之不治而議論，達其頂峯。（宣王時，319-301 B.C.）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

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sup>31</sup>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sup>32</sup>

國君對士的敬重竟有至此，無怪乎戰國學術思想有如此蓬勃的氣象。<sup>33</sup>

## 五、「哲學的突破」與「道統」「政統」相互之關係

以上兩節，簡述了士階層本身的發展及風格的建立，與國君卿相禮賢養士之風，現在則討論士本身內在的演變及士與在上位者相互之關係。

### A、「道術將為天下裂」

周代的禮制，維持了長久的秩序後，從西周末年便開始崩壞，到戰國以後，完全變了一種風貌。在舊秩序崩潰，而新秩序尚未建立之時，便有諸子百家並立之情況。有的人堅持著舊秩序、舊道德；有的人加以修正，有的人則全面反對。莊子天下篇所謂「道術將為天下裂」，正確切的道出時代走向。余英時先生將這句話解釋為「哲學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他認為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除由外部的社會變遷外，更須由其內在理路理解，春秋戰國的「禮壞樂崩」是「百家爭鳴」的前奏。所謂「哲學的突破」即對構成人類處境之宇宙本質發生了一種理性的認識，在中國表現得



最爲溫和，因爲中國的傳統寄托在幾部經書之中。此一傳統經過系統化之後，在宇宙秩序、人類社會和物質世界諸方面，都發展出一套完整而別具一格的想法。余氏又以爲，儒家的革新路線最主要且能爲人接受的。<sup>③4</sup>

在此「哲學的突破」中，筆者以爲余氏似乎忽視了法家的重要性，儒家爲一般知識分子接受，法家則受統治者的喜愛，二者對後來歷史影響的重要性，筆者以爲是不分上下，而法家對實質政治的運作或許有更大的影響。

「哲學的突破」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即是：由親親到尚賢，由禮到法。黃俊傑先生有論：

戰國以降的社會中逐漸強調契約性之關係，親緣與血緣背景不再像以前那樣備受重視；一種理性合法的權威逐漸建立；社會之平治也逐漸走向客觀的「法」的道路。禮區分在「特殊精神」之下人際關係應有之差距；法明辨在「普通精神」之下各人之平等性；禮所以致其異，法所以求其同。禮與法之分野，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從重視「親親」演變爲提倡「尚賢」兩大階段之大分水嶺。<sup>③5</sup>

春秋以前有禮無法，春秋以後法漸代禮，但兩千年來，一直是禮、法相混，很難找出適當的平衡點，這或許要從儒家、法家之相互作用中求其解答。筆者以爲，探討中國歷史，偏重儒、法、道中任一或二，都無法得其真相。

### B、「道統」與「政統」

「道統」與「政統」常被視爲對立的東西，事實上兩者並非是不相容的，過分的將兩者畫分，筆

者總以爲是過分高估了知識分子，又過分低估了爲政者，正如近幾年本地知識分子常作「智者」與「權者」的畫分，總給人一種自我標榜且貶低他人的感覺。

事實上，儒家所謂的「道統」是儒家的道，道家若說「道統」則是道家的道，而「政統」也只不過是若干法家的「道統」罷了。中國歷史上，確有儒家的「道統」與若干法家人物所代表的「政統」之爭，「道統」與「政統」原來的分別乃在認同於道或認同於政治實體，若將其誤解爲當政者與在野者的對立，那便大謬不然了。

戰國時知識分子所認同的是什麼？就一般情況而言，似乎不是所謂的「道統」或「政統」，而是利之一字（或許可以算是某種形式之「道」統）。

廉頗之免長年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sup>③6</sup>

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平民以前只能欣羨的貴族生活，只要有錢就辦得到，人們的欲望較之以前提升了許多，因此有「以市道交」之語。再看蘇秦和李斯：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迎什二以爲務。今子辯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sup>③7</sup>

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

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sup>③⑧</sup>

上下交逐利於天下，故君臣以利合，有利則來，利盡則去，君臣之關係成爲買賣雙方，各取所需，所謂「道統」與「政統」之爭，事實上只是戰國時少數不惑於利的人的困境罷了。

（這麼說並不代表整個知識階層的走向，但筆者以爲確是當時的主流。當我們在討論歷史上的知識分子時，同樣的不可一概認爲知識分子有理想、有抱負，固守「道統」，事實上知識份子只代表讀過書的人，是個中性名詞，並不代表其道德。）

## 六、從「商君書」到「呂氏春秋」

戰國分裂之局面，終由秦之統一天下結束，秦很快就滅亡，接著而起的漢朝，奠定了中國兩千年帝制的基礎，而漢之政制多因循秦朝，因此討論秦的政治、思想各方面，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以後的發展。

### A、「商君書」與「呂氏春秋」

商鞅到秦變法在秦孝公時（360 B.C.）而「呂氏春秋」成於西元前三世紀末期，也就是秦滅六國前夕。這當中一百多年，可以從「商君書」和「呂氏春秋」的異同略見其端倪，而「呂氏春秋」對漢以後的政治又有著重大的影響。<sup>③⑨</sup>

商鞅是衛宗室之後，呂不韋是平民商賈出身；商鞅處於秦初強的關鍵時期，呂不韋則處於秦天下獨尊之時，這些背景的不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此二時期之異同。

「商君書」純爲法家著作，當商鞅之時，秦國內游食言談者甚衆，嚴重影響國力，加上商鞅本人貴族出身，可能在心裡不能接受那種民不安業的情形，故有反游民（其中大部分爲游士）之主張。

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持農戰而尊。<sup>④①</sup>

「商君書」中一面鼓勵農戰，一面主張法家治術，並反游民，代表著舊社會解體的初期現象。到了「呂氏春秋」時代，由於各國間流動的頻繁，各家思想紛紛傳入秦國，而游士亦在呂不韋入秦後益盛，在「呂氏春秋」中却是諸子百家雜陳，獨缺法家思想。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之天子。<sup>④②</sup>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sup>④③</sup>

聖人深慮天下，莫實於生。<sup>④④</sup>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sup>④⑤</sup>

它不但認可了游士，事實上「呂氏春秋」一書正是呂不韋門下游士所作。當中對國君並不把它置於高高在上之地位。但在戰國時代，各國君主多尋求集權，於是法家便提出「君尊臣卑」的觀念<sup>④⑥</sup>，到戰國末，秦之法家治術更達相當程度，「呂氏春秋」的出現，有以下兩層意義：

- (1) 代表當時天下文化已相當統一，光是呂不韋門下，便有儒、道、墨、陰陽等各家學者。
- (2) 對當時現實政治的反動，後世學者所謂「道統」的提出。

在秦當時政治環境下，「呂氏春秋」所代表的思想自然要遭到拆殺了。

## B、逐客事件

後呂不韋因故被黜，秦王亦下一道「逐客令」，這是秦朝以前對游士勢力打擊的第一次。秦以前少有私門養士者，呂不韋門下食客却有三千人之多，而又代表著對當時政治的反動，這一股勢力不是秦王所能忽視的。雖然後來逐客令因李斯上言後取消，却成爲以後焚書坑儒之前奏。<sup>④⑥</sup>

## 七、統一帝國的塑成

上面六節簡論之社會、政治的變化與游士文化之混同，共同塑成了大一統帝國。

### A、統一形勢

當時天下大勢，國家愈來愈少，也愈來愈大，在廣泛而大量的社會平面流動後，國與國在各方面差距變小，而統一的帝國，於經濟的整體運作亦有其必要性，統一只是遲早問題。事實上在疆域的統一之前，觀念上的統一早已完成。

### B、統一觀念

許多學者亦早有統一觀念。如孟子以爲天下將定於一，禹貢九州之說，鄉衍大九州之說等。知識分子早已超越對國家的認同，擴大而爲對天下的認同，這從戰國時游士之盛便可見出。

### C、展望

社會的變遷與游士現象，造成了統一帝國，而帝國成立後，又有怎樣的改變？統一前夕的逐客事

件到秦演爲「焚書、坑儒」，到漢又如何？知識分子有怎樣的改變？思想本身如何發展？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 註釋

- ① 最早可能是見於國語卷六齊語第四條：「管子對曰：『……爲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裳，多其貨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
- ② 眾說紛紜，可參考，徐復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台北，學生書局，頁八六一—八八；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頁四一〇、九三一—一〇八；杜正勝，周代城邦，台北，聯經，頁七七—七八；及徐、杜二氏上引書中對「國人」的討論。
- ③ 三者當然是互爲因果，但我們以爲其分量仍有不同，可大致分爲因果二層。
- ④ 許多學者都持此觀點，如徐復觀、余英時、杜正勝、黃俊傑……等。參看徐復觀，前引書，頁八八—八九二；余英時，前引書，頁四；杜正勝，前引書，頁一五〇—一五五；黃俊傑，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問學，六十六年九月，頁五八—六三。
- ⑤ 漢書，台北，鼎文，卷四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頁二一四五。
- ⑥ 史記，台北，大甲，卷五八，梁孝王世家，頁二〇八三。
- ⑦ 史記，卷一二四，游俠列傳，頁三一八八。
- ⑧ 參看孫鐵剛，秦漢時代士和俠的式微，台大歷史學系學報第二期，頁一一—二二。
- ⑨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三八—四〇。
- ⑩ 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頁二五—二二。

- ⑪ 同上，頁二五三。
- ⑫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頁二八六四一六五。
- ⑬ 何烈，中國牛耕技術的起源，大陸雜誌，五十五卷四期，另參看許倬雲，兩周農作技術，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頁八〇三—四二。何氏推斷中國牛耕之起源當在紀元前七、八世紀間，不早於周宣王時代（827 B. C.），不晚於魯宣公十一年（598 B. C.）。許氏則以為春秋時已有牛耕，戰國則逐漸普及。
- ⑭ 管東貴，戰國至漢初的人口變遷，史語所集刊第五十本第四分。
- ⑮ 何烈，前引文。
- ⑯ Cho-yun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Chapter 5 Economic Changes pp. 107-39, 台北，新月，1971.
- ⑰ 何烈，前引文。
- ⑱ 許倬雲，前引書，Chapter 3. Wars and Warriors, pp. 53-77.
- ⑲ 同上，Chapter 2, Change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pp. 39.
- ⑳ 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頁五〇九。
- ㉑ 有關此段綜論，比較早的資料是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頁五〇九：「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虢，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改，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改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另童書業之討論亦極精采。春秋史，台北，開明書店。
- ㉒ 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六十八年，卷二十三，郡縣條，頁六二九—六三一。
- ㉓ 關於這方面，余英時先生有許多闡發，參看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
- ㉔ 同上，頁十四。

- ②⑤ 杜正勝，周代城邦，台北，聯經，頁六十三。
- ②⑥ 史記，卷四四，魏世家，頁一八三九。
- ②⑦ 同上，頁一八四七。
- ②⑧ 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頁二三四五。
- ②⑨ 史記，卷七五，孟嘗君列傳，頁二三三—三五四。
- ③⑩ 同上，頁二三五五。
- ③⑪ 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頁一八九五。
- ③⑫ 同註④，頁二三四六。
- ③⑬ 有關此段，余英時先生的論述非常精闢，參看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五七—七六。
- ③⑭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三〇—三八。
- ③⑮ 黃俊傑，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問學，頁二七—二八。
- ③⑯ 史記，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頁二四四八。
- ③⑰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頁二二四一。
- ③⑱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頁二五三九—四〇。
- ③⑲ 徐復觀先生對呂氏春秋相當重視，參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台北，學生。
- ④⑰ 商君書解詁卷一，農戰第三。
- ④⑱ 呂氏春秋卷一，本生。
- ④⑲ 同上，卷一，貴公。
- ④⑳ 同上，卷二，貴生。
- ④㉑ 同上，卷七，禁塞。

④ 有關此，余英時先生有很精采的見解，參看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皆收入於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

⑤ 參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卷八五，呂不韋列傳，卷八七，李斯列傳。

## 明代的書院與政治

John Meskill 著

朱 淑 萍 譯

中國帝制時代的書院，在近代已經引起了同情的注意，例如有一位學者曾經讚美書院是近一千年來最高等的學術機構和最有力量的思想中心<sup>①</sup>。相反地，在明代卻流行著一個敵對的看法，而使書院遭受攻擊。雖然其活力是如此勉強地被人承認，但其學術內容卻受到懷疑。當書院被指控以種種方式來擾亂和平的時候，書院的影響變成了爭論的問題。結果一連串的詔令毀滅了他們。

對於書院的鎮壓顯示他們具有政治面和教育面，其政治意義存在於書院組織了知識份子，這些人因此而獲得某種共同利益的感覺。當然書院的政治經驗只是其歷史中的一部分，對於書院概括性的說明還要注意到其他幾個主題，特別是其教育方式。

然而其政治經驗相當地確定了他們在中國人的生活中的地位，更廣泛地說它提示我們在像中國這樣一個政治活動，集中於政府的社會裡頭，一個獨立的組織如何會傾向政治活動，接著政府如何應付這些單獨的政治組織。

### 背景